

汝州风穴寺始建年代探赜

常法亮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河南 新郑 451150)

Abstract: Fengxue temple could not be built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not be built in Tang dynasty too. In fact, some relics have existed already at Fei Zhangfang ag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A great deal of cypresses in the canyon of Fengxue temple were artificial plantation at first, the two cypresses in front of ancient Xiangji temple were relics of Han dynasty. According to document recording, the author consider the Fengxue temple maybe begin at Chupin first year of Ea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Han Dynasty; Xiangji temple; Fengxue temple; Tiantai sect; Linji sect

摘要: 风穴寺不可能始建于北魏,更不可能是唐代所建。事实是:东汉费长房时代此地已有遗迹,风穴寺峡谷内的漫山遍野的柏树最初系人工栽植,古香积寺门口的两棵柏树“一捧伞”“三炷香”系汉代遗留。结合有关典籍记载,风穴寺极可能始建于东汉初平元年。

关键词: 汉代; 香积寺; 风穴寺; 天台宗; 临济宗

在历史上,风穴寺与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并称中原四大名寺,是天台宗七祖贞禅师、临济宗三祖南院慧颢、四祖风穴匡沼、五祖首山省念的驻锡地,是佛教天台宗和临济宗两宗祖庭,在河洛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结合形成汉传佛教的历史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由于风穴寺不具有白马寺和相国寺位居帝京的优势,又没有少林寺敕建的特殊性,故留下来的史料很少,对研究风穴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有关风穴寺的始建年代就有多种说法。总结起来,共有四种说法:

一曰汉代所建。此说来自于当地民间传说及部分历史文献中的模糊记载。国家文物局专家罗哲文在其著作《中国名胜——寺塔桥亭》一书中有此说,“寺的历史非常久远,相传汉代已有,重建于北魏”^①;《风穴续志》也记载,“寺肇于汉,盛于唐”。

二曰最晚建于北魏。此乃是五代后汉乾祐三年(950年)所立的《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文及康熙《风穴志略》及乾隆《风穴续志》所载,“由是观之,则所谓元魏时重修者近是”。

三曰唐代所建。此说源自于对寺内“七祖

塔”的研究。郑州大学荆三林在为《风穴寺文史荟萃》一书作序时持此说,“贞禅师之前,此地无寺”^②;雍正《河南通志》曰“风穴寺,一名白云寺,唐大中(847年~860年)初创建。”

四曰北魏所建。此乃是对碑文“后魏,山前为香积寺”一语不能确指的敷衍论断,这也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说法。《中国名胜——寺塔桥亭》一书中就有此说,“风穴寺创建于北魏”^③,实为以讹传讹。

一、风穴寺始建年代诸说质疑及推断

首先,关于“始建于唐代”的说法,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是荆三林教授的“贞禅师之前,此地无寺”说(以下简称“荆说”);二是雍正《河南通志》的“唐大中初创建”说。先谈荆说,其依据是“今风穴寺所在,终元魏之世,不属元魏疆土……其地既非元魏疆土,元魏亦不能建寺于刘宋之地”^④。此说甚为荒谬。原因一,北魏太和十八年“后魏始于此置南汝原县”,其东南30公里处置汝南县(置今宝丰县赵官营村),而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此地东45公里的郟县改为龙山县,属顺阳郡。元魏都洛阳,汝州东部的郟县、东南的宝丰均属于元魏领地。显然,荆三林的推断不攻自破,若其推断成

立，难道元魏领地里有刘宋的飞地？原因二，乾祐三年（950 年）八月十五日《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文记述“大业中，释教中否，缙侣流离，直至唐初，只为阿兰若耳”，如若唐代始有此寺，则北魏、隋代的香积寺从何而来？

再谈雍正《河南通志》的“唐大中初创建”说。开元十三年（725 年），风穴寺内的贞禅师圆寂，由玄宗谥为“七祖”，得舍利数千粒，于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在寺院现址构筑佛塔，名“七祖塔”。此塔至今树立有开元十六年三月所立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咒”碑一座（1983 年修缮七祖塔时发现）。这就否定了雍正《河南通志》“大中初创建”的论断！

荆说也谈到，佛塔有两类，一类为经塔，一类为墓塔，经塔建于寺院内，墓塔建于寺院外。“七祖塔”既然是贞禅师的墓塔，则肯定在寺外构建，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寺院是开元间七祖

塔建立后所建，只能说当时的寺院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七祖塔尚未被围至寺院内，说明佛塔附近当时有寺院。

其次，关于风穴寺建于北魏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笔者更是感觉此说极不负责任，有诸多疑问在里面。

疑问之一，北魏时期所建寺院多有凿岩之作，而风穴寺所依龙山、黄虎、玉皇皆为石山，为何没有见到一块凿岩作品？

疑问之二，在现存古籍中为何没有关于建于北魏的明确说法？

疑问之三，北魏时期，汝州时称梁县，但是全县共有人口 470 人，甚至整个汝北郡所辖五县共有人口 2289 人，怎么有条件建立寺院？

我们不妨从下表中分析一下北魏时期的梁县（现汝州）是否有能力兴建这所寺院。（见表）

表：汉至唐汝州人口统计表

朝 代	公元纪年	建制名称	人口总计	资料来源
西汉惠帝元年	公元前 194 年	梁县	21000	《资料编审》清梁启超编《郡县人口升降表》
西汉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梁县	81000	《资料编审》清梁启超编《郡县人口升降表》
东汉元和三年	公元 78 年	梁县	33700	《资料编审》清梁启超编《郡县人口升降表》
东汉永和五年	公元 140 年	梁县	47000	《资料编审》清梁启超编《郡县人口升降表》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	公元 220 年	梁县	不足 4700	根据《河南通史》推测
三国魏景元三年	公元 262 年	梁县	6300	清顾炎武《中国郡县考》
北魏永熙元年	公元 532 年	梁县	470	清顾炎武《中国郡县考》
隋大业七年	公元 611 年	汝州	47000	清顾炎武《中国郡县考》
唐神龙元年	公元 714 年	汝州	53000	清顾炎武《中国郡县考》
开元二十八年	公元 740 年	汝州临汝郡	62000	清顾炎武《中国郡县考》
天宝十三年	公元 754 年	汝州临汝郡	78700	清顾炎武《中国郡县考》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元 140 年至公元 532 年间，当时的梁县总人口从 47000 人减少到 470 人，这与当时整个中原地区的人口变化状况相一致。据《河南通史》第二卷“东汉时期，河南省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也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户数达 180 多万，人口 980 多万（公元 140 年数据）。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与军阀混战，使

这一地区人民大量死亡和外迁，从而导致这一地区人口锐减。曹魏建立之后，人口不足东汉时期的 1/10”^⑤，也就是说，若以平均数作为推算，在公元 220 年时候，当时的梁县总人口可能不足 4700 人。曹魏政权建立后，从其他地方大量移民到洛阳附近，但是到公元 262 年，梁县人口也仅仅反弹到 6300 人。紧接着，受南北朝时期北

方连年战争的影响,梁县总人口又直接下降到北魏永熙元年(532年)的470人,甚至整个汝北郡只有人口2289人。据《魏书》载“汝北郡,孝昌三年置。治阳仁城(今汝州市汝河南),天平二年罢,武定元年复……领县五(石台、南汝原、治城、东汝南、梁),户五百五十四,口二千二百八十九。”^⑥可以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荒无人烟,缺少兴建寺院的劳动力资源。

同时,这个时期的汝州战争不断,几无宁日。清景日珍《说嵩》:“而自汉魏劫迁时,洛许倥偬之际十数年,转徙蹂躏,民乃愚也。洎晋永嘉以后,战争不息,无宁衽焉。元魏徙居,评定安集之才三纪耳。逮乎二魏,爰及齐周。河洛汝颖之坟,边镇比垒,牧马树帜,场燐相望也。”^⑦汝颖地区始终处于战争腹地,缺少兴建寺院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上分析可知,在公元220年到公元532年之间,汝州地域战火不断,人烟极度稀少,既没有可能大兴土木来兴建风穴寺,又没有传播佛教的信徒做基础,在此期间建造寺院不符合当时情况。但是不排除舍宅为寺这种可能,只是目前尚无这方面的史籍依据。

第三,关于“最晚建于北魏”或“建于汉代”这两种说法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记载的。根据寺内立于五代后汉乾祐三年(950年)的石碑《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载,“后魏,山前为香积寺”。说明北魏时香积寺已存在于山口,即该寺最迟建于北魏。而不能据此而认为香积寺建于北魏。那么,香积寺究竟建于北魏之前的什么时代呢?笔者提供如下思路供研究者研究。

《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载,“后魏,山前为香积寺,数当兵火,像毁寺焚,有乡人卫大丑收以材石,构筑佛堂于此山之西北,即今之院基是也。至隋,又为千峰寺”。这一段记载透出两点信息:一是风穴寺毁于战火,而且是数次被战火焚烧,并非一般的火灾;二是被战火焚烧后,又于隋代之前由乡人卫大丑重建。寺既焚,像又毁,那么究竟风穴寺所遭遇的是哪一场战火呢?公元580年5月,周宣帝病死,8岁的宇文阐(周静帝)继承皇位。北周开国功臣、周宣帝的岳父杨坚以大丞相的身份“辅政”。公元581年3月3日(北周静帝大定元年二月十四日)杨坚废周静帝为介公,北周亡。同时,杨

坚自立为皇帝,筑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东南一带)为国都,改国号为隋。需要提醒一点,北周被隋替代,并未发生战争,而是通过宫廷政变获得政权的,这就排除隋朝建立时破坏寺院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卫大丑是隋代人,而应当是隋代之前的人。在冷兵器时代,战争对房屋的破坏不致于如此严重,即便有个别人趁机一把火点了寺院,也仅仅落得个“寺焚”,也不至于落到“像毁”的地步。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是南方政权还是北方政权,都非常崇尚佛教,除非故意,否则不可能“像毁寺焚”。比如最为残暴的后赵石虎仍然崇奉佛教。近代无锡人丁福保先生转译日本真宗大谷派学僧织田得能著作《织田佛学大辞典》而成《佛学大辞典》,其中载:石虎(295年~349年)五胡十六国后赵第三世皇帝。石勒之从子。字季龙。骁勇绝伦,长于征战,颇为石勒所重……对外远伐近攻,内则大兴土木工事,赋重役繁,民不堪其苦,国力日衰。然其在文化方面,继石勒之后,尊礼佛图澄,且许人民出家,华北佛教因而隆盛。永和五年歿。在位15年。可见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是把礼佛作为自己获得统治地位的“天意”,对佛教是宠信有加,故风穴寺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可能性较小。唯东汉末期的董卓之乱,烧杀抢掠、血雨腥风。据《资治通鉴》卷五十九记载初平元年(190年)二月“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徙其余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⑧。据《河南通志》卷二记载“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强迫汉献帝刘协与朝臣西迁长安……迁都前夕,董卓下令‘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子遗’。又令吕布发掘诸帝陵墓,搜取财宝……”^⑨另据《汝州市志》汝州大事记“初平二年二月十七日,起义军孙坚与袁术合并讨伐洛阳的董卓,卓派大将胡轸和骑兵都督吕布与孙袁大战于阳人聚(今汝州),胡军大败,都督华雄被孙坚所杀。”^⑩在这次战争中,对洛阳周围的宫庙寺院,董卓有令,“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子遗”。汝州离汉魏洛阳城有80公里,在所烧范围内。既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火对风穴寺损害的程度不会那么大,则极有可能是董卓之乱毁了风穴寺。若此推

论成立，则初平元年（190年）之前已有香积寺的存在。

但是时间能不能更确切呢？我们知道“香积”一词来源于佛教经书《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香积品》云“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其界一切皆以香做楼阁，经行香地苑园皆香，其食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又云“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香积寺一名即出自此经，那么《维摩诘经》何时翻译成汉文的呢？《维摩诘经》是《维摩诘所说经》的简称，也简称《维摩经》，或者也称《不思议解脱经》。此经的汉文译本有六种以上。

1. 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由严佛调在洛阳译出，称《古维摩经》，有两卷。

2. 三国时代的吴国黄武二年（233年）由支谦在武昌译出，称《维摩诘经》，有两卷。

3. 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由竺法兰译出，称《毘摩罗诘经》，有三卷。

4. 西晋惠帝泰安二年（303年）由竺法护译出，称《维摩诘所说法门经》，有一卷。

5. 后秦弘始八年（406年）由鸠摩罗什在长安大兴善寺译出，称《维摩诘所说经》，也称《不思议解脱经》，有三卷。

6. 唐太宗贞观年间，由玄奘三藏法师在长安大慈恩寺译出，称《说无垢称经》，有六卷。

但最早的版本是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由严佛调在洛阳译出，称《古维摩经》，有两卷。则香积寺的肇造不可能早于公元188年，不晚于190年。一般情况下，经籍的流布尚需一个过程，但是维摩诘经是在洛阳翻译，由于东汉时梁县是皇家苑囿广成苑、皇家沐浴地广成汤的所在地，汉灵帝尚佛，而且新经书的问世需要在京都附近就近流布。故《维摩诘经》对汝州的影响应当很快。佛经当年翻译，当年传入汝州是可能的。

二、风穴寺始建于东汉的旁证材料

风穴寺始建于东汉的说法有无佐证呢？笔者认为风穴寺及汝州市志中关于东汉费长房的记载以及风穴山上满山遍野的古柏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路径。《直隶汝州全志》载“费长房，汝南人，尝为郡市吏，爱风穴清幽可居，虽属洞栖焉。一日投竹杖化龙于桥上乘而仙去，今桥名升仙桥。”据康熙年间的《风穴志略》记载“升仙桥，桥横洞口，费长房见壶公于市悬壶卖药，因

师事之，得其术，归栖山壑。一日，化龙于桥上，乘而仙去。此与汉书所载略不同。”据寺内立于大明天启五年的《风穴寺重修山门天王殿记》载“自沼禅师铎声再振，尔时与禅师并起有费长房与（吴）几复鼎足为此寺吐气。长房飞仙蜕去，吴公潜修数年，从此鹊起为时名，功业烂焉。今桥与洞具在，则寺以人重……”而这个费长房正是东汉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记曰“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长房遂欲求道……于是遂随从入深山，践荆棘于群虎之中。……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遂可医疗众疾，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或在它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①关于“汝南人”这一说法，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证据，现在的汝南县附近没有“深山”，故费长房“入深山”只能南行（大别山区）、西行（伏牛山区）、西北行（历史上的嵩箕山区），但目前已有资料显示信阳、南阳境内没有费长房在其间修行之传说，只风穴寺一地有此传说，说明风穴寺关于此说的可靠性；另，《后汉书》系南朝宋范曄撰，其时，北方为北魏政权，而北魏时的汝南治今宝丰县赵官营村，距北魏时期的梁县（今汝州）仅30公里，《后汉书》中的汝南是否指宝丰值得商榷。且清康熙《汝阳县志》也有费长房之传说，汝阳频临汝州，历史上一直属于汝州管辖，这就更加证明费长房所修行场所确在汝州嵩箕山系。壶公、费长房乃东汉名医。从《志略》和《后汉书》的记载结合分析，此峡谷东汉费长房时代已有遗迹——桥和修行场所。

其次，风穴山上的柏树可以佐证寺院建于汉代。风穴寺位于风穴山与黄虎山（又称黄鹿山）之间的峡谷中，面南背北。我们注意到，除风穴寺所在的白云湾以外，风穴寺周围十公里范围内的山坡上几乎看不到有柏树生存，唯独风穴寺所在的风穴山与黄虎山峡谷中满山遍野都是柏树。据乾隆《风穴续志·卷五上》释海月《风穴寺异柏记》，“惟环寺界中有之，临邱（丘）则绝无焉”。此处柏树林东西宽度约300米~500米，南北长度约1500米。这种现象说明：风穴寺界

内的柏树林最初是人工栽植的，绝非天然柏树林。尤其是在1947年以前，风穴山上全是古柏，而且原“香积寺”旧址门口，即山口处的“三炷香”“一蓬伞”最大，其树围均在4.7米以上。这两棵树恰恰处于古“香积寺”的位置上，当是香积寺历史的见证者。那么这三棵树是何时栽植的呢？

我们不妨以中岳庙内“化三门”外的古柏说明一下：“嵩山古柏008号——盘龙柏”树围4.5米，“嵩山古柏009号——卧羊柏”树围4.38米，“嵩山古柏021号——猴柏”树围3.8米。以上古柏，经鉴定均属汉柏^⑫。由于风穴寺与中岳庙均属嵩山，均在山阳，土壤、水土结构相似，故可以肯定风穴寺这两棵柏树也是人工栽植的“汉柏”。

其三，今风穴山口外的刘沟村、黄虎山西侧的黄庄村北部均为风穴寺的墓塔林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刘沟村沟崖处一座墓塔随沟崖的坍塌而倒塌，从根基底部出土一个汉铜镜，至今被附近的杨庄村村民杨根喜收藏。

由此可以佐证：香积寺始建于东汉。

三、风穴寺始建于汉代的史料记载

《风穴志略》上卷《风穴志序》中记“呜呼！自无始以来，风穴久岿然中土矣。汉魏而降，非无名宿，栖息其间……”似乎汉代已存在《风穴续志》卷五《创建风穴山凤凰崖桂香庵记》记有“风穴白云山，地连嵩少……自汉唐以来，多名迹”，似乎也谓汉代已有《风穴志略》上卷《风穴志序》中又曰“明万历中，郡守刘公覲文，博雅君子也，其游风穴诗云‘宿莽残碑有汉文’，此必先有汉时遗迹，刘及见之，而今亡矣。由是观之，则所谓元魏重修者近是”。似乎明朝万历年间寺院还有汉时碑碣，而且，作为汝州郡守的刘覲文亲眼所见；类似发现乾隆年间的《风穴续志》也有。《风穴续志》卷五中有释海月诗《默庵先生过访诗次韵》曰：

白云回接少林遥，玉勒春嘶破寂寥；

鸟语林端知客过，泉流涧响觉冰消；

塔登岫顶摩唐碣，寺数残碑记汉朝；

大雅遗音禅诵日，浑忘食味等箴韶。

“寺数残碑记汉朝”说明释海月也亲眼看到了汉朝残碑的存在，而且数量不只一块。

我们可以想象，明朝时候的郡首刘覲文和清朝乾隆年间的释海月都亲眼看到了风穴寺内汉代

碑碣，这说明汉时风穴寺的存在不是空穴来风，当时是有实物依据的。对于刘覲文和释海月的所见是否属实，我们应该分析这两人的人品：刘覲文乃汝州郡守，地方行政大员，“博雅君子也”，所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释海月乃乾隆年间名僧，《风穴续志》卷四记载“风度端惠，持行坚卓，工松雪笔法，说诗谈碣确有根据。善开导后学，静定有守，不妄交游，演法传戒，恢宏祖道，缙素倾心，门庭济济。”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初二日，乾隆游嵩山时，在中岳庙召见风穴寺住持释海月，因奏对如流，天颜大喜，曰“此有道者，为风穴老人也！”^⑬赐饌一席、金二十锭并庄亲王赠“慈云慧日”额四大字。可见，这二人文德兼备，所言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那么刘覲文和释海月为什么不把数块汉代石碑内容或能看到的字写出来呢？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一是，碑上所记内容或许就是有关费长房在此修行的记载；二是，由于是残碑，边缘毁损更严重，落款及题首都已不能识别。故只能从文字的中间内容看到费长房在此修行之事，二人不写有关文字，盖因明代碑记中已有费长房之记述。

又，《风穴续志》卷五州守罗大美《风穴山白云禅寺重修毗卢大殿记》言，“寺肇于汉，盛于唐。为临济下四世沼祖道场，南北称祖庭焉”。将风穴寺创建于东汉的说法给予非常明确的表述。

为什么风穴寺没有留下确凿建造时间的历史证据呢？笔者认为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宋代建造钟楼时，部分碑记可能埋没。北宋宣和七年风穴寺建造钟楼，由于铁钟重达9999斤，采用“堆土法”将山沟填起来，将铁钟推高之20米高处，完成悬挂工作。这种堆土法必将掩埋部分碑碣，其取土地近在山口，必然造成山口的香积寺各种碑碣的遗失或破坏。

第二，“三武灭佛”，部分碑碣毁灭。由于风穴寺内现存最早的石碑是后汉乾祐三年（950年）所刻，而在这之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一是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446年），二是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三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这也可能造成汝州风穴寺寺院创建碑碣毁灭。

第三，龙山阳侧在北周武帝时，建风伯庙

时,可能对香积寺的部分碑碣有毁损。

第四,可能与寺院尚未来得及刻制创建碑刻即遭“董卓之乱”毁坏。

笔者认为:此地若起初并非佛寺,则另当别论。若确是佛寺,则清康熙《风穴志略》及清乾隆《风穴续志》的“汉代残碑”和“寺肇于汉,盛于唐”的说法就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的肇造年代,根据推断当在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工程尚未彻底完工,有关寺院碑记尚未来得及刻制即遭“董卓之乱”毁灭。风穴寺之所以至今没有确切肇造纪年,盖与当时并未完工有关。这个阶段建造寺院与汉灵帝崇佛的记载相合。

①③罗哲文 《中国名胜—寺塔桥亭》,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上接第53页)祀本氏族或部落共同的先祖、天地四方、自然之神或海神后掩埋于坎中形成的。河南新密新砦“坎”一类大型浅穴式祭祀遗址的发现和四川三星堆2个祭祀坑大量祭祀用器物的发现即是明证。

① 许明纲 《大连市金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2期。

②④⑤⑧⑨⑩⑪⑫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22~23页、41~44页、22~23页、50~57页、86~87页、246~247页、270~271页,大连出版社,2000年。

③⑥⑬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辽宁大连市大嘴子

②④刘天福 《风穴寺文史荟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⑤⑨程有为 《河南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⑥ (北齐)魏收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

⑦ (清)景日珍 《说嵩》,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 《嵩岳文献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⑧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⑩ 汝州市地方志志办公室编 《汝州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⑪ (宋)范晔 《后汉书》,中华书局,2280页,2005年。

⑫ 宫嵩涛 《中岳庙》,香港国际出版社,1998年。

⑬ 温玉成 《少林访古》,百花文艺出版社,349页,2001年。

(责任编辑:黄林纳)

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2期。

⑦⑩张翠敏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聚落遗址研究》,《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双砣子与岗上》,41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报告中陶簋5件,其中T4:49陶器,报告称之为簋,其形制和所有陶簋均不符,而更似钵,故笔者将其排除于陶簋之外。

⑮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辽宁大连大砣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大学考古系 《妣媯与寨根》,35~1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⑱ 李国强、卓庆跃 《妣媯遗址出土的铙形器》,《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曹汉刚)